

● 新闻传播学

潜隐而可能:国民性因素对媒介 确立生态世界观之违碍

夏冠英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 夏冠英(1958-),男,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摘要] 确立生态世界观是媒介生存、发展之所需。对于中国媒介确立这种世界观,某些国民性因素是潜在的反对因素,可能起到违碍作用,需要中国媒介加以克服。

[关键词] 生态世界观;国民性;克服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0773-04

生态世界观是一种有益于媒介生存、发展的世界观形态,而国民性则是“一国或一民族全体所共同具有的心灵文化特征”^[1](第103页)。中国国民性,作为对中国媒介世界观形成及其形态可能起潜移默化影响作用的民族精神成份,其某些因素确是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对因素,对这种世界观在中国媒介之确立可能起违碍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明这些因素,并思考如何加以克服。

一

生态世界观是指人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既对立、又统一。西方生态理论家科利考特指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冲突与互补”^[2](第98页),凯斯特勒也以为:世界作为一个系统,形成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3](第93页)。作为引导人类正确认识世界的观念形态,生态世界观从哲学范畴为人类确立了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准则,即:既讲对立,又求统一,辩证结合,互制互补;而这,又是现代生态哲学构建、确立、倡导这一观念的理论旨归所在:引导人类克服近代以来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重对立、轻统一倾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演绎,所谓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是指媒介以为自己与环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基于这种认识,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既讲自主(对立),又讲适应(统一),于自主与适应的辩证结合中谋求生存与发展。

众所周知,媒介处于社会交往中心。作为环境主体,媒介的生存、发展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环境因素制约。对于美国新闻业的发展,美国新闻史学家埃德温父子认为,“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加起来也左右报业情况”^[4](第1页)。有鉴于此,确立一种生态世界观,以正确认识自身与环境对立统一关系,实现对这种关系既讲适应又讲自主的辩证式处理,乃是媒介生存、发展之所需。适者生存是世界太多的新闻史实确证过的媒介生存法则,如美国在其新闻业起步期,若干报纸因与当局冲突而被迫停办,它之所以有了《新闻信札》这第一张报纸,就是因为其创办者坎贝尔具有那种“能够适应环

境的能力”^[4](第34页)。另一方面,媒介适应环境还必须显示自身的能动性、自主性,若不然,诚如如下资料所描述,媒介存在会出现主体性空洞:名存而实亡。这条资料称:各家报纸目前都在增刊,但增多多少,什么时候增,说了算的不是总编辑、社长,而是广告人:“以广告费为终极目标的增刊、增版背后,真正的老板是广告人,而不是报人”^[5](第235页)。这里,媒介所以出现主体性空洞,正是因为媒介处理自身与广告主关系只讲顺应而不讲自主。

然而,确立生态世界观,即便是媒介生存、发展之所需,而对于中国媒介却有一个应予关注的问题:如果认定民族精神对民族媒介世界观形成及其形态有着可能的潜在影响,那么,中国国民性,所谓“中华民族在特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情感、意志特征的总和”^[1](第1101页),作为民族精神重要的成份,隐含某些可能对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起违碍作用的反对因素。

探究一定观念主体特定世界观之成因是个理论难题,因为其成因复杂而多变。但是,可予肯定的是:一定的观念主体,作为民族精神传统之苗裔,其世界观之形成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受到民族精神之影响,是可能的。黑格尔以为:民族一切发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6](第268页),不自待说,观念性的、与民族精神更具对应性的世界观更应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媒介生态世界观之确立,可能会受到民族哲学观念影响。而果若如此,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念会成为其有益的精神滋养,确切说,是这种观念对中国媒介认识自身与环境关系的统一性、处理这种关系讲求适应性会起到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可能受到国民性影响。应当承认,中华民族作为优秀民族,其国民精神一定有着值得肯定、应予宏扬的成份。但是,对于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它的某些因素,作为潜在的、可能起违碍作用的反对因素,逻辑上我们的确可以判定为真。这些因素的形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乃是民族特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所致。故而,论析这些因素,就必须基于民族既有的特定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

二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过程”^[7](第82页),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也谈到:民族性格的种种差异存在于民族“某一现存的生产方式里”^[8](第27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社会的手工劳动,主要经济形态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封闭、半封闭自然经济。前者,对国民以缺乏主体意识为特征的自弱自小心态起了一定化育作用,而后者对国民自守、抱独、排他心态起了一定化育作用。从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视角看,前一种心态是生态世界观讲对立、求自主潜在的反对因素,后一种心态则是生态世界观讲统一、求适应潜在的反对因素。

农耕社会的手工劳动是人在生理上与自然高度贴近的劳动,如插禾、除草之类常规劳作都有人的部分身肌进入泥土。这种人在生理上与自然贴近,最终衍化成人在心理上与自然的贴近,而由此,人有了与自然亲密、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在人的知性层,人也有了对天人之别、主客之分感知上的模糊。这种模糊经由历史积累,对人主体意识的发育与觉醒起到了阻碍作用。人由于不能意识到自己之于自然是主体性存在、自然之于自己是被对象化的客体,而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力量、尊严与价值。对于人的这种主体意识的缺失,相关论者称之为“主体性混沌”,而这反映于中国国民心态,择要论之,就是中国人对自我存在(包括力量、尊严、价值)缺乏展示意识,惯于自我遮蔽,心理上呈现一种自弱自小倾向。如所周知,贵柔守雌是中国人立身之常策;反“冒尖”,求中庸,是中国人处世之常态;而所谓中国人记取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濯之”之古训,看似在关爱人生,实则是要求人自我遮蔽、自降生命亮度;如此等等都体现出在力量、尊严、价值上自弱自小的倾向。

要确立生态世界观,这种观念的讲对立、求自主要求的观念主体显示主体性。故而,对于中国媒介,国民心态的这种自我遮蔽、自弱自小倾向,作为国民性因素,乃是其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对因素。事实上,追溯以往,中国媒介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只要背离生态世界观的讲对立、求自主,在精神向度上,就与这种国民性因素具有一致性。诸如不作独立价值判断而盲从错误政策,故弃自主权而甘心接受

广告主操纵, 旁置传播定位与宗旨而迎合受众低级趣味, 甚至一如有的资料所披露某些记者、报纸以自贬人格、招格媚俗阿世³ (第241页), 如此等等, 作为媒介对自身与诸种环境因素关系之处理, 都由其间媒介自立、自主、自重精神的缺失而表征出与生态世界观讲对立、求自主相背离。而作为精神现象, 媒介这种自主、自立、自重精神的缺失, 正与自我遮蔽、自弱自小国民性因素同质。正是依据这种同质, 逻辑上, 我们可以判定这种国民性因素作为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反对因素为真。

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封闭或半封闭自然经济, 使国民少有产品交换、经济往来; 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 又使国民缺乏更具规模的劳动合作。如此经济形态与劳动组织形式在农耕社会的传承、保持、延展、甚至扩深了国民间外在生存形式与内在心灵内容的间距, 而由此它们遂成为国民自守、抱独、排他心态或习性养成之温床。国民的这些心态或习性, 可由如下民谚俗言反映: “老死不相往来”, 是国民人际习性上的抱独; “各人自扫门前雪”, 是国民生存形态的自守; 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反映的则是他们处世态度上的排他, 如此等等。

对于生态世界观之确立, 讲统一、求适应作为生态世界观的另一面, 则要求观念主体在己他对待关系中对己显示开放性, 对他显示容受性, 故而, 与之相反的抱独、排他国民心态或习性, 作为国民性因素, 便是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的另一潜在的反反对因素。同样, 检视媒介实践, 凡中国媒介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只要背离生态世界观的讲统一、求适应, 都在精神向度与这种国民性因素具有一致性。作为个案, 1979年, 《人民日报》不能及时响应中央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政策, 于头版头条发表河南反对这一政策的来信, 并加编者案予以支持⁹ (第483页), 则充分说明中国媒介某些时候统一观念之缺乏、适应意识之薄弱, 而这, 作为精神现象, 正与抱独、排他国民性因素同质。亦是基于这种同质与逻辑之上, 我们同样可以将这种国民性因素作为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另一潜在的反反对因素判定为真。

如上两种国民性因素, 作为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反对因素, 即使逻辑上可以判定为真, 但由于这类因素存在的潜隐性、历史性, 它们对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实际起到违碍作用, 只是或然的, 隐蔽的。另一方面, 这些国民性因素扎根于民族集体无意识, 业已衍化为国民处事、处世上心理惯性, 对于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 它们实际违碍作用的或然性、隐蔽性发生, 又是可从必然性上言说的。这样, 对于这类国民性因素, 中国媒介有必要注意克服。

三

作为民族精神传统之苗裔——国民性因素携带者, 中国媒介要克服这类国民性因素, 从根本上说, 是有待社会消除滋生的土壤的。在当代中国, 生产方式除农耕生产, 还有机械工业、高新技术生产; 经济形态上, 除自然经济, 还有已呈蓬勃之势的商品经济; 这种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多元化, 确实从经济史上打破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指出的中国历史一直所呈现的“永远不变的单一”情状。但应看到, 单家独户的劳动组织, 农耕上的手工生产, 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 作为如上两种国民性因素滋生的土壤, 在当今中国远未销声匿迹。这意味着, 中国媒介克服这两种国民性因素, 会受到社会存在制约。

不过, 即便如此, 从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看, 只要中国媒介自觉克服这两种国民性因素,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突破社会存在制约, 实现克服, 依然是可能的。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制约、决定作用, 但对于社会意识之于社会存在的距离感、独立性与反作用, 从未予以否认。另外, 对于突破社会存在制约, 实现克服, 中国媒介对自身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之发掘、之呈扬, 会是有益之举。知识分子, 依据美国学者 E·费尔斯的看法, 是“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 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同寻常反思力的人”¹¹ (第963页)。这里, 所谓“特殊的敏感”, 所谓“不同寻常的反思力”, 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对于国民性, 中国媒介作为知识分子集群单位, 如果发掘、呈扬这种精神, 就会自觉于批判其落后、有害的因素(反思), 追求并致力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精神更新(敏感)

[参 考 文 献]

- [1] 冯天瑜. 等. 中华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 余谋昌. 生态哲学[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3] [美] 弗·卡普拉. 转折点[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4] [美] 埃德温·埃迈里, 迈克尔·埃迈里. 美国新闻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2.
- [5] 巴晓芳. 大众化报纸论析[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6] [英] 罗 素. 西方哲学史: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7] [德]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美] 费·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9] 方汉奇. 等.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车 英)

Factors of National Character to Obstruct China's Media from Having Ecological World Outlook

XIA Guan-y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 Guan-ying (195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bstract: A medium must have an ecological world outlook if it want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Some latent factor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re opposite to the ecological world outlook and may obstruct China's media from having it, so,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s media to overcome the factor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 ecological world outlook; national character; overcome